



# 论新时代文化象征视域下宏大叙事的发展策略

程天明, 王义德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宏大叙事作为政治共同体进行文化宣介和意识形态展演的一种叙事方式, 一直以来被广泛运用于各类政治文本中。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 解构宏大叙事的呼声却愈来愈烈。解构的目的在于建构, 而建构一套具有高度合法性的宏大叙事框架需要在部分保留原有元叙事要素的基础上, 添加新的元素。文化象征系统凭借其特有的主体间性哲学逻辑和完美的意义生成机制, 构筑起一种“他者在场”的意识刺激, 从而为政治文本的宏大叙事风格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重构策略。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政治文本; 宏大叙事; 文化象征系统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2-0062-07

##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rand narrativ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ymbolism in the New Era

CHENG Tianming, WANG Yide

(Law School,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Grand narrative, as a kind of narrative mode of cultur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exhibi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political texts. With the rise of postmodernism philosophy, the appeal of deconstruction of grand narrative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e purpose of deconstruction is to construct a set of grand narrative framework with high legitimacy, which needs to add new elements on the basis of retaining the original elements of meta narrative. The cultural symbol system, with its peculiar intersubjectivity philosophy logic and perfect meaning generation mechanism, builds a sense of “otherness” presence stimulation, and thus provides the grand narrative style of political text with a set of effective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political text; grand narrative; cultural symbol system

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 西方学界兴起了一场后现代主义浪潮, 至今该浪潮仍作用于哲学、政治学、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后现代主义在其批判单向度的人, 解构理性、大写的人的过程中, 以其特有的平面化阐释模式, 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就引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征, 即强调消解宏大叙事。然而对于消解宏大

叙事的质疑, 似乎与要求隐退宏大叙事的声音同样强烈。

宏大叙事研究始于利奥塔的《后现代的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sup>[1]-22</sup> 一书, 他在对现代知识合法性的无情批判中, 探讨了宏大叙事的词源学定义和分类, 通过割裂宏大叙事的内在思辨性, 探析了宏大叙事遭遇合法性危机的缘由。理查德·罗蒂<sup>[2]</sup>从哲学角

度批判了“真理”等宏大概念,本着“实用主义”的价值信条,力藉科学来解构宏大叙事。雅克·德里达<sup>[3]</sup>分析了宏大叙事的结构,认为观察世界的准确标准不在于永恒的共性而在于事物的差异性。迈克尔·福柯<sup>[4]</sup>把宏大叙事与政治领域联系了起来,他将宏大叙事视为一种“权力知识结构”,是权力竞逐和妥协的结果。相较于西方学界,国内学者在研究宏大叙事过程中更多带有政治色彩或倾向。刘婷等<sup>[5]</sup>分析了宏大叙事类作品的重构策略,即实现民族命运与个体伦理的融合,这实际上回应了宏大叙事内固有的元叙事与小叙事的矛盾问题。周忠元等<sup>[6]</sup>则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中国梦”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石和传播策略,分析了“中国梦”实现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相契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曹典顺<sup>[7]</sup>通过廓清“宏大叙事”、“价值共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三者间的逻辑关系,揭示了宏大叙事的现实必要性,讨论了宏大叙事的建构策略。

关于宏大叙事的研究,中西方各具特色,西方偏重于从文史哲等领域来发现和解构“宏大叙事”,而中国学界在研究中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偏重于探析宏大叙事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对于宏大叙事的态度,中国学者更多的是认可而不是否定。本文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下,系统地分析宏大叙事类作品的文本结构,并从主题、内容和叙事技巧等三个方面考察后现代主义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为了更好地发展宏大叙事,本文拟借助文化象征系统来弥合宏大叙事中的三对矛盾性因素。

## 一、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宏大叙事”概念

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宏大叙事的消解,是从知识体系的祛魅开始的一种批判古代道德合法性、中古宗教合法性、近代术语合法性的历时性过程。他们在批判和反思西方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发现本体论不过是塞壬的歌声,有将人们引入虚幻的“终极观点”的危险,从而展开了“对元叙事的质疑”<sup>[1]207</sup>。研究宏大叙事的解构问题首先应该从明确宏大叙事概念入手,而对于宏大叙事的深入解读无疑应该从后现代主义思想中寻找答案。

“宏大叙事”概念最早来源于文学领域,对其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出现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诞生之后,且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代表人之一利奥塔联系紧密。利奥塔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谈到了现代知识合法性的问题。他认为,现代哲学

家力藉理性思辨建立一套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尝试是行不通的。他在理性思辨的诸多环节中,广泛运用家庭、国家、民族、社会等符号,试图创造出一种不证自明的绝对精神。这种对于宏大素材的应用和整体性的强调,无疑忽视了一切具有个别性、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事物,这无疑是宏大叙事的硬伤。正如利奥塔所说,“他们玩一种许多民族都有的游戏,叙事的游戏……对所有游戏不断提出存在的问题,并把它归结为本体论……然后我们会进一步把它分成等级,以便证明一个支配一个”<sup>[8]</sup>,这就造成了元叙事的压迫局面。不难看出,宏大叙事在利奥塔那里无疑就是一种大叙事或元叙事,它与理性思辨、科学知识和绝对精神密切相关。

从叙事主题上看,宏大叙事无疑是宏大且具有连续性的。追求合法性的宏大叙事往往表现为寻求“一种普遍必然的客观标准、基础”<sup>[9]</sup>,它不仅需要反映历史的总体趋势和旨归,更应当在细致地探究历史的各个阶段中勾画出历史的终极目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宏大叙事的价值正是在于高度反映这一价值,同时在承接前一个时代主题和引导后一个时代主题中,体现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和必然趋势。从叙事内容看,宏大叙事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自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一百多年来,各类政治文本中仍充斥着大量歌颂上帝、英雄等人格化对象和自由、民主、科学等抽象概念。此类宏大叙事作品是掌握话语权的官方和群体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起来的,因而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即使在宣扬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宏大叙事的意识色彩也有增无减。唯物史观强调“人民力量的回归和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sup>[10]</sup>,在书写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往往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详细论述和引介,更容易站在人民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这无疑会使文本叙述具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特征。从叙事风格上看,宏大叙事钟爱于整体把握。这种整体性不仅表现在对“部落的或民族的或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sup>[11]</sup>的梳理,还表现在内容涵盖各种社会关系且各部分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

结合以上特征,笔者将宏大叙事定义为:部落、民族或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特定时代主题,追求终极目标或准则,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内在逻辑性、可重复演现的叙事模式。对于宏大叙事的研究通常与一系列对立的观点相伴相生,如现象与本质的对立、同一与多样的对立、现实与虚幻的对立、所

指与能指的对立。因而许多人在将宏大叙事定义为一贯的主题,完整而全面的叙事内容,政治化的功能倾向,并且广泛应用总体性、普遍性、共识性、意识形态化的术语的同时,又在其后加上了“宏大叙事是与细节描写、日常题材、草根化倾向、解构和分析的叙事方式、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叙事理念相对立”这样的概念补充。因此,笔者认为,探讨解构政治文本中宏大叙事风格的可能性应该从研究如何弥合宏大叙事的矛盾性因素中展开。

## 二、合理与局限: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首先从“宏大叙事”概念入手,他们发现宏大叙事已不适于解释和描述世界。宏大叙事本身暗含许多对立性因素,这些对立性因素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被不断放大。后现代主义类型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与宏大叙事特征相反的概念,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策略。因而,在重构宏大叙事之前,需要系统地介绍一下宏大叙事的矛盾性因素。笔者根据宏大叙事的文本结构,将宏大叙事的矛盾分为三种。

### (一)叙事主题:单中心与多中心

对于宏大叙事的考察,首先应该放在主题的选择上。宏大叙事的英文翻译为 Grand Narrative,因而该叙事类型的主题首先应该是重大、本质性、普遍性、整体性的。宏大叙事的初始形态可以追溯到西方史诗文献中,如雨果、伏尔泰、托尔斯泰等人的长篇巨著。宏大叙事作品力图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观念的真理性、美好的价值追求和事物运动的本质。这种与文本叙事的差异性相对立的本质主义倾向正是宏大叙事一以贯之的主题,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莱布尼茨的单子,还是康德的物自体都将世界万物归于一个同一。而宏大叙事正是从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出发,将一切文本叙述指向一个永恒的本质。此外,宏大叙事的一中心还表现在叙事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从某一点出发,不断深挖,最终表现出一种深度模式。钟爱宏大叙事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大量利用国家、民族、革命、理性、平等、自由等宏大符号,但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特定地理界域内,能成为宏大叙事的往往只有一个主题。正如张庆熊在概括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定义时,将宏大叙事定义为,“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某些占主导地位的叙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乃是以‘科学知识的大叙事’、‘思辨理性的大叙事’和‘人性解放的大叙事’为标志的”<sup>[12]</sup>。可见,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思辨理性,亦

或人性解放,宏大叙事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这一点也可以从史学研究中得到验证,二战后的美国史充斥着美国独特性、美国缺陷方面的著作,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主流。

后现代主义哲学则争锋相对,针对一中心论提出了多中心论,其背后的哲学依据正是与本质主义相对立的反本质主义和多元真理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人们的需求大多是刚性的、物理性的需求。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的需求发生了“裂变”,多样化的需求带来了多元化的文化。正如艾恺所言,“文化是个体性且独特的看法,它们各自表达其集体经验,全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同样真切而有效的工具”<sup>[13]</sup>,真理不再是人所共知的唯一了。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真理,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奉为真知的事物。从这种价值相对论出发,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主流话语规则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抨击,将叙事主题倒向反理性的一面,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暴力、救赎、死亡、性欲、惩罚等辞藻。行走在碎片化的时代中,拉康、德勒兹等人公开宣称要与一切总体性知识即哲学断绝关系。他们打碎大写的人,怀疑一切永恒而稳定的事物,将短暂性契约视为至宝。这势必会推翻建立在统一主体上的宏大叙事,将宏大叙事定义为某些精英编撰出来的形而上学的怪物,“元知识”成了臆想出来且无法证伪的符号。高度随意性和无法确证的偶然事件铺满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生长、无限丰富的语言使知识永远无法成为固定不变的整体,早已分崩离析的元知识神坛上已经建起了百家争鸣的对话平台,“规范”已成了过去。在整个文化界则呈现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边缘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局面。自此,宏大叙事的主题不再一以贯之,开始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

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似乎走过了头。从理论上讲,政治文本中的宏大叙事深刻地体现出权力逻辑,因为政治的本质在于获取或保有权力,因而权力实质上是宏大叙事的永恒主题。从实践上看,对于宏大叙事的舍弃是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漠视,是不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此外,多样化、异质性的文化也不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借鉴,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主流的文化加以引导。但在当今世界,宏大叙事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走上变革之路。

### (二)叙事内容:意识形态化与日常化

宏大叙事往往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隐含着使

某种话语体系权威化、合法化的神秘功能。它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sup>[14]</sup>。罗斯在这里所强调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权,指的是对话语权的把控,是一种将特定意志灌输给特定群体的权力政治。此外,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化还体现在宏大叙事的源与流中。首先,特定社会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出自身所特有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人们在书写宏大叙事时所普遍遵循的。而这些行为准则却是各种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相互竞逐的产物,这可以在曾经风靡欧美国家的西方中心论中得到验证。持有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学者无不以西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审视世界,在他们的鸿篇巨著中充斥着西方立场和观点。其次,宏大叙事在文本叙事中往往以国家、民族、部落、社会、阶级为主角,试图将这些主角的历时性发展描绘成一种有始有终的完美图景。而这些恰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虚假的意识”与“观念的上层建筑”,也即人们所说的意识形态。

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创造了一种压迫的合法性,这种压迫也表现在宏大叙事对日常叙事和私人叙事的压迫,因而需要打破宏大叙事的空洞化政治功能,走向生活。后现代主义者在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冲突中,站在了个人性的一边,倡导一种生活化、日常化的叙事风格。这类叙事风格的风靡是话语权下移的结果,人们纷纷回归生活世界,将目光从人类、民族、国家、世界中移向日常生活和群体目标。他们试图从个人的立场或观点出发去体验生活,以边缘群体或小众化视角来发现和解释世界。因而在许多人的作品中充斥着个人情感经历和生活琐事,这种个人性的表意过程经过反复的修辞和塑造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主流文化分庭抗礼。正如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加缪在其作品中,通过对某一爱情故事的诗意性描述来阐释自己的哲学观点和反抗精神。后现代主义力图消解宏大叙事中的虚幻,恢复人的“在场”,他们反驳一切形而上学,通过赋予日常生活的美学价值,吸引人们关注日常生活,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历史有一种触手可及的真切感受。在叙事过程中,人们不再仅仅关注宏大叙事类作品,而是力图实现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融合。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在抽象地表达日常生活实践中提炼具有共识性的知识源,最终这些都将成为宏大叙事的素材。另一方面,宏大叙事借助大众传媒,实现了抽象理念的具体化和叙事表征的

生活化,可以说,日常叙事赋予了宏大叙事新的活力。

### (三)叙事技巧:整体布局与细节描写

宏大叙事中整体把握与细节描写的对立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者眼里的平面模式与深度模式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又可以被分为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真实与虚幻、所指与能指的区别。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象与本质不应该遵循一种由外及内的逻辑,现象不仅仅是通往本质的路标,他们的作品往往突出感性化的文本描述,而不注重意义的阐释。这势必为人们随意解释表层、现象和能指留下空间,导致泛符号化和泛文本化的倾向。后现代主义对于深度化的阐释模式的消解总体表现为“放弃寻求一种仅为个体信仰和理智所确认的对世界的再现企图”<sup>[15]</sup>,这种中心消解的模式将意义悬置起来,却带来碎片化、紧张、分裂的物象,而且碎片与碎片被随意组合,缺乏逻辑性。这些后现代性的作品包罗万象,充斥着矛盾,这在政治文本中是不可容忍的。因为政治文本的最大功能在于说服,缺乏逻辑性的文本必然给受众带来思维混乱,无法得到普遍的认同。

后现代主义的泛文化倾向正是应和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追求,他们强调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借鉴,然而也许他们太过于看重交流和借鉴的结果,从而忽视了交流与借鉴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是各种文化间相似或同质的部分,随意地解释和过多关注不稳定的部分通常会对文化交流带来不利的影响。质言之,后现代主义者的失败在于忽视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解构政治文本中的宏大叙事不仅是可能的,还是迫切的。重构的策略在于处理好一中心与多中心、意识形态化与日常化、整体布局与细节描写的对立问题。针对这三对矛盾,研究者不应采用后现代主义者的消解路径,也不该采用传统文本撰写者的因循守旧态度,而是应该在保留传统宏大叙事风格有益成分和吸收后现代主义者合理观点的基础上,引导宏大叙事走向变革之路。文化象征系统正是以其特有的功能和属性成为了这条变革之路上的路标和打开“宏大叙事之困”的钥匙。

### 三、文化象征系统:破解“宏大叙事之困”的钥匙

象征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用某种媒介物(包括具体的实物或抽象的观念)表达特定的意义。文化象征系统则是将诸多象征体系整合起来的具有结构性的有机体,无疑它属于一种文化的范畴。文化象征系统中的政治象征元素为解决宏大叙事的第一对

矛盾(一中心与多中心)提供了工具。政治象征的第一特性是政治性,而政治生活离不开权力关系的构建与消解,政治象征成为权力活动争相操纵的对象。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都依赖于一些象征符号、仪式行为或特殊话语的采行来维持其运转。政治象征成了“政治人”争夺或影响话语权、抢占意识形态高地、合法化政治行为、影响权力秩序与结构的工具。因而政治文本中仍需要引入大量政治象征符号,从而体现宏大叙事的一般主题,即权力关系。

受后现代主义疯狂批判宏大叙事的影响,政治文本中宏大叙事的主题选取变得日益多元,譬如更加关注和平主义、环保运动、女权主义等,但始终无法抛开政治生活的永恒主题,即权力。因而,看似多中心的政治文本实则是一中心。需要指出的是,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sup>[16]</sup>,权力已不再特指政治权力了。政治文本中也充斥着其他权力关系。因而处理好政治文本中的宏大叙事问题,需要在坚持权力中心的基础上,协调好文本叙事中的各类权力关系。文化象征系统除了能够提供政治象征外,还能从社会、宗教、经济等方面迎合政治文本的其他主题。以明清时代的徽州牌坊为例,它在文化层面上代表了徽州地区的亚文化和“三纲五常”之类的古代主流文化;在社会层面上,它彰显了某些宗族家庭的辉煌历史;在政治层面上,它代表着古代王权和王权维护下等级制度,而这一点如今却被人忽视。可以说,徽州牌坊在文化权力、社会权力、宗教权力等权力关系掩盖下暗含着重要的政治权力。政治文本中的文化象征系统包含着众多权力类型,各种权力关系至少在许多场合下看起来是平等的。

如果说政治文本中文化象征系统的权力倾向使解决“宏大叙事之困”成为可能,那么文化象征系统的哲学依据则使其解决“宏大叙事”问题成了必然。文化象征系统的哲学依据是一种从胡塞尔的间性推导发展出来的主体间性哲学,这种哲学后来延伸出对话理论、交往理论等诸多理论。这种从主体性论题脱离出来的哲学,强调的是两个或多个主体间的交互关系。这种主体交互关系,既是对传统主客二分的积极改造,又是对主体与主体共存关系的回应。对于传统主客二分的改造可以表现为,将客体视为沟通的对象,客体不再是自然界中的实体和心智上的先验存在物的代名词。伽达默尔在将主体间性引入阐释学过程中,发现了意义和语言的关系。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主体间沟通的根本方式,还是理解的

对象,主体在对话过程中达到了对“意义”的相互理解。主体不仅是有思想的人,还包括含有思想的文本。正如人们在研读历史课本的过程中,实现了与历史主体的对话,在“视域融合”的背景下,达成了对世界的共同理解。诸如史诗、小说、舞台剧之类的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sup>[17]</sup>,这种关系就是交往伙伴关系。

文化象征系统完全遵循着这种主体间性哲学的逻辑。从索绪尔的观点出发,文化象征系统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即载体和意义。这种观点事实上仍是一种主客二分的观点,载体成了具有实在性的实体或抽象性的符号,意义则来自于主体的思维。受后现代哲学的影响,所指与能指的对立被消解了。正如利奇所言,“任何一个象征符号在发生意指作用时,都存在着由发送者编码和接受者解码的信息交流过程”<sup>[18]13</sup>,象征符号呈现出主体到主体的模式。在象征主义者看来,伽达默尔的主体与文本的对话,实际上就是主体与主体的对话。因为主体与文本之间的桥梁是意义,文本中的意义也是主体赋予的,并非是先验的,因而文化象征系统呈现出了主体-客体-主体的沟通路径。

主体间性哲学提倡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建立在主体与主体间平等的地位上,为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相融合提供了思路。因为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矛盾说到底就是谁来书写,为谁书写的问题,无论是他者书写,还是自我选择都应当排除后现代主义者所抨击的元叙事的压迫。王加丰<sup>[11]</sup>指出,宏大叙事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暗含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精英塑造象征物,再由民众被动接受的单向度联系,这似乎与主体间性相悖。然而合法性理论的出现证明了宏大叙事应该接受日常叙事的优点,需要借助反映了主体间性逻辑的文化象征系统。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人民主权被人们普遍接受,强调自上而下建构的宏大叙事受到冲击的同时,传统的驭民思维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受这种趋势的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象征不仅是统治阶级进行权力实践的工具,还注意到人民在塑造象征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角色首先反映在象征的群体性。大部分象征物事实上映射着群体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和心理态度。而处于社会中的少数政治精英是不可能控制一切文化价值层面上的事物,这些事物实际上是人类长期实践的产物。格尔茨认为,“文化

是公众所有的,因为意义是公众所有的”<sup>[19]15</sup>。权力精英虽然会努力争取对于意义的解释权,但是意义终归还是要为公众所接受才能成为文化,象征也只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接受才具有合法性。

象征是人们传递信息的工具,其本身作为一个符号仅仅具有单一的意义,当人们对其赋义和表达意义时,它才具有了生命。正如前文已述,利奇<sup>[18]13</sup>将象征发生意指的过程视为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而编码者和解码者都是具有指向性的主体,这就是象征的主体性特征。象征离不开普罗大众,它不再只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个人或特定群体的工具。最后,象征的情感性也决定了象征不可能为少数权力精英所垄断。涂尔干<sup>[20]</sup>认为,象征使社会情感具有了实在性,是表达人类情感和愿望的重要依据。一个具体的象征物可能暗含着忠诚、热爱、服从、自豪、爱戴等正向情感,也可能包含仇恨、嫉妒、骄傲、负罪感等负向情感。革命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利用象征的隐喻特性,充分地调动了人们的情感。然而,当社会中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象征的效能也随之降低。可见,象征所表达的人类情感应该是公众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政治精英的情感,公众情感激发出了象征中所存在的巨大能量。象征的群体性、主体性和情感性都体现了象征的塑造不应是由上而下的单向路径,而应该是建立在相对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关系。

前文已述,针对宏大叙事的第一困境,本文利用了政治文本中文化象征系统的政治属性来予以回应。那么,宏大叙事的第二困境,即意识形态化与日常化的对立,本文诉诸了主体间性哲学的逻辑思路。在宏大叙事的创造过程中,叙事主体应该摒弃以往的灌输式叙事方式,在文本叙事中充分发挥象征的功能,积极寻找日常生活中的叙事素材,按照主体(叙事者)—客体(象征)—主体(受众)的路径,建立起叙事主体与受众间平等的伙伴关系。

#### 四、动静结合:宏大叙事的意义重构策略

如果说解构宏大叙事的目的在于建构,那么建构必须要有一个由浅入深的结构。象征已经描绘出了建构宏大叙事的前两个步骤:一是以权力为中心来确立具有政治性的主题,同时统筹各种权力关系;二是坚持主体间性逻辑,吸收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发挥公众的主体性作用,建立叙事主体与受众的伙伴关系。那么如何建立主体间互动关系,则是重构宏大叙事的最后一步,这一步需要协调好宏大叙事技巧中的矛盾性因素,即整体布局与细节描写间的对立。

处理宏大叙事技巧的整体与部分问题,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里主要说的是格尔茨的“深描法”。格尔茨<sup>[19]16</sup>认为,文化是一种风俗的情境,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格尔茨通过对民族志和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指向一个更宏观的认识。宏大叙事也可采取这种方式,在文本叙事中可搭建一个具有结构性的框架,层级越深,意义越丰富。各层次内部的意义间以及每个层次的意义间都具有逻辑清晰的意义链。这就要求叙事主体在叙事时,注重细节描写和逻辑构建,通过各种符号将各种意义串起来。此外,在词汇的选取上应该着重选择细致且易懂的词汇。正如莱维·斯特劳斯<sup>[21]</sup>所说,解释经常表现为以较为浅显易懂的繁杂取代不太让人们明白的繁杂。因而政治文本的创作应该尽量少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多用一些“接地气”的通俗话语。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通过对直观事物的描写引导人们自由想象。这种想象要求叙事主体不应将写作重点过分拘泥故事的诉说和行为的再现,而是引导受众自由式、开放式的想象。譬如,在党史类作品中词语“红色”非常常见,它常常与“红旗”“鲜血”“太阳”等符号连接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意义团,最终引起人们回忆中国共产党人建国前的峥嵘岁月。

处理宏大叙事技巧的矛盾问题事实上是对宏大叙事的深层建构,因为这已涉及象征的意义层面,象征则以其多重意义的特性为宏大叙事的重构提供了首选策略。象征具有多义性,单个的象征符号可能代表许多东西<sup>[22]49</sup>。塔图学派认为多义性实质上源于象征本身的结构,他们将象征分为表达文本和内容文本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存在着深刻的不确定性。<sup>[23]</sup>表达文本更加浅显、直观,内容文本往往更加隐晦、抽象,表达文本所涵盖的意义难以一一对应内容面的意义,因而两者存在着映射关系,既可能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可能是一对多、多对一或多对多的关系。有学者在论证象征的意义潜能时,引用了洛特曼的观点,“象征借助自己的表达和某些符号语境发生的关联不会穷尽语言要素所有潜在的搭配能力”<sup>[23]</sup>,象征因此成了一个语义场,可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任何一个场合中。

象征具有多义性,意义的排布并非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言的。塔图学派根据表意形式的复杂程度将象征分为简单象征和复杂象征。简单象征受语境的影响较小,其表达面和意义面联系相对松散,因



而对人们的联想没有太多的束缚,其意义的能产性很强,此类象征包括红色、太阳、点、线、球、十字等。而复杂象征却要求联系具体的语境,表达时甚至需要考虑场合和身份,如特定国家的国旗、王室的徽章等。象征越是简单,其意义越是丰富,结构也越是复杂,越不受制于语境。因而在宏大叙事创作中,叙事主体应该在需要激发人们联想的地方运用简单象征,在强调、劝诫和规范某件事时,使用复杂叙事。

特纳<sup>[22][64]</sup>将象征意义分成三个层次,即注释意义、操作意义和方位意义。注释意义是一种最本真的意义,它是参与者、组织者、调查者给予的意义诠释。操作意义产生于象征的运用过程,主要存在于转折和调整行为的阈限阶段。该阶段中社会结构呈现出结构-反结构-结构的状态,参与者处于一个“公共域”内,就像处于罗尔斯笔下的无知之幕后,参与者都处于绝对的平等地位,他们在其中发现意义、解释意义、重释意义,这种就是操作意义。方位意义是一种结构上最宏大的意义,它是象征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意义。这三类意义呈现出一种不断升华的过程,宏大叙事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在象征的方位意义的大框架下,规范操作意义,引导注释意义,建立起多条具有逻辑性的意义链。

## 五、结 语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激活了宏大叙事内部所固有的矛盾,一中心与多中心、意识形态化与日常化、整体布局与细节描写的对立更是催促着宏大叙事走向变革之路。对于宏大叙事的重构,应该从弥合这三对矛盾入手。文化象征系统以其包含着的内在的政治属性,以及显性的主体间性哲学逻辑和丰富的意义场,成为重构宏大叙事的首选策略。本文通过剖析宏大叙事的理论困境,希图挽回宏大叙事在文本叙事中的颓势,为叙事主体提供一个策略选择,这在强调文化强国和控制意识形态阵地的当今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进一步对“宏大叙事”类作品进行详细地“析解”,未来研究将着重对其进行探讨。

## 参考文献:

- [1] 让·弗朗弗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唐小兵,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 [2] 理查德·罗蒂.后现代哲学[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407-425.
- [3]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7-36.
- [4] 米歇尔·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88-113.
- [5] 刘婷,付会敏.宏大叙事的个体性超越: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叙事的成功转向:以《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例[J].当代电影,2010(8):137-141.
- [6] 周忠元,赵光怀.“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构建和全民传播:兼论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契合与背反[J].江西社会科学,2014(3):235-239.
- [7] 曹典顺.“价值共识”与“宏大叙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理论前提”再认识[J].理论探讨,2012(6):66-69.
- [8] 让·弗朗弗瓦·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M].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3.
- [9] 丁匡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基于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J].现代哲学,2017(4):17-23.
- [10] 龙柏林.集体记忆构建之当代变迁的哲学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1):49-54.
- [11] 王加丰.从西方宏大叙事变迁看当代宏大叙事走向[J].世界历史,2013(1):4-14.
- [12] 张庆熊,孔雪梅,黄伟.合法性的危机和对“大叙事”的质疑:评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J].浙江社会科学,2001(3):93-97.
- [13]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唐长庚,张信,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6.
- [14] Ross D. 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5,100(3):653.
- [15] 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M].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0.
- [16] 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345.
- [1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60.
- [18] 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M].卢德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 [19]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 [20]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
- [2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
- [22] 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3] 康澄.文化符号学中的“象征”[J].国外文学,2018(1):1-8.

(责任编辑:王艳娟)